

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

备受关注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终于在5月11日发布。老龄化、少子化问题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热点。有人口学者认为，中国正在经历老龄化下的“人口危机”，如不尽快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并采取鼓励生育措施，经济发展将受到严重负面影响，亦会影响未来科技创新。同样有观点认为，尽管已经放开二胎生育，但效果不佳，生育率下降、老龄少子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即便完全放开生育限制，也难以提高生育率，还可能导致经济占优势地位者多生、经济占弱势地位者更难生育，进而出现代际不公平。民众的焦虑则在于过高的房价和养育负担才是不愿生育真正的原因，而老龄时代究竟会怎样，人们仍是水中望月。

按照人口学研究的划分，将一个国家（地区）60岁以上人口超过其人口总量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超过其人口总量的7%界定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则为“超老龄化社会”。1999年2月，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0%，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2005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7.5%。根据七普数据和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9年的预测数据（“联合国数据2019”），至迟在2025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14%，从而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届时，我国24-65岁（以及更广义的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将达到峰值，随即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阶段。

我国从20年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到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只间隔不到25年时间，这个老龄化速度与日本相近，是全球主要国家中最快的（表1）。近些年常与中国人口状况进行比较的印度，其老龄化进程也将很快（仅次于中国和日本），只是目前印度尚未进入老龄化阶段，因而有不少观点认为印度有可能成为替代中国的下一个“人口红利池”。

老龄化问题之所以在我国此前很长时间未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人口结构变化有时滞性，即从人口快速增长到增速下降、总量达峰，再到总量下降，需要经历不止两代人的时间。这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中国人口学者早在1980年代就已开始对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并已经了解，长期而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是不可逆的。

今天人们对老龄少子化问题的关注，与经济发展内卷、都市房价过高、教育资源受限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看似在讨论人口问题，其实是在讨论机会和公平问题。人口学和经济学研究对老龄化阶段和劳动年龄人口何时达到峰值十分关注，近期国内关于上述话题的讨论也非常密集。

人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或许也应该反过来讲，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发展，人应当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关系经济发展的过去和未来。人口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甚至政治结构，对国家的财税制度、福利体系也会产生决定性影响。

根据人口经济学的通常界定，25-64岁（或更广义的15-64岁）属于劳动年龄人口，低于15岁和高于64岁属于需要抚养的儿童和老年人口。当一个国家（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大、需要抚养的人口占比最小时，往往被认为处于“人口红利”期。

人口经济学研究认为，进入老龄化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通常最大，意味着迎来“人口红利”。随着人口结构进一步转变，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如果新增人口不足，则需要抚养的人口占比越来越大。此时，只能依赖提高生产率去维持或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又由于现代社会的福利支出刚性，社会负担将不断加重，对资本积累、财税制度、福利体系、投资方向、年轻一代的发展机会甚至其社会行为方式都会带来一系列深远影响。可以说这些问题关系到这个世代乃至未来世代的每一个人。

根据联合国数据（2019），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预测为14.64亿人），随之开始下降，至2050年下降至14.02亿人，2100年下降至10.65亿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从2020年的12%，增至2050年的26.1%，至2100年将占31.9%（表2、表3）。基础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受到现实约束，尽管上述预测数据可能随着时间不断修正，但总体趋势和大致时间不会有太大问题。

目前关于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研究非常多，对老龄化的担忧也日益加剧，关于提高生育率的对策建议也十分繁杂，但许多研究都是站在当下看当下、站在本国看本国。事

实上，站在全球视角看，人类社会的老龄化是很晚近才出现的现象。自法国从1864年首先步入老龄化以来，至今不过157年时间；60岁、65岁的老龄界定，也是1950年代才划分出并被联合国采纳的标准。日本在1930年代为了应对老年人口快速增加而创建退休制度时，人均预期寿命还不到50岁，规定的退休年龄却是55岁。1935年美国开始强制推行社会保险时，能够活到65岁的人还不到11%（Drucker, 2018）。

但在未来50年内，全球主要国家将全部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的阶段，自人类工业化以来的绝大部分先发国家和后发追赶国家，其人口总量都将收窄，这些国家基本都将面临人口总量缩减的情况。历史的看，人口数量和预期寿命的大幅增长，是欧洲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现象。公元1000年时，全球只有2.7亿人，1700年增至6亿，1820年才突破10亿。此后全球人口加速增长，1950年达到25亿，1990年突破53亿，2020年接近78亿。

各国（地区）的人口膨胀及后来的老龄化，并非同时进行，而是经由西欧最初的人口膨胀浪潮次第展开的。这一进程最初深受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医疗卫生革命的影响。

欧洲在初期的人口膨胀阶段实现了对殖民的扩大化，将西方文明扩展至全球；因人口膨胀的次序不同，新老殖民国家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在欧洲人口膨胀趋缓的同时，殖民地的人口开始膨胀，使反殖民运动足以战胜殖民统治，民族独立普遍实现；先行进入老龄化的欧洲国家担忧人口减少导致的式微，同时又担忧全球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资源受限，在面临自身生育率难以实质回升的前提下，开始采取移民、外劳等策略维持本国总人口及劳动力数量，并建议、帮助后发国家控制人口增长。

在与工业化结合后，后发国家的人口膨胀导致结构变化，出现了所谓“人口红利”期。先发国家受限于本国老龄化导致的成本上升、需求下降，开始通过全球化将产业链的劳动力密集部分转移至后发工业国，并同时扩大海外市场，与后发工业国的“人口红利”相结合，由此形成“阶段性双赢”局面。可以说，全球化是工业化的结果，更是因工业化而导致的次第起伏的全球人口浪潮的结果。

由于人口基础和工业化起步时间不同，不同后发国家的“人口红利期”出现次序也不尽相同。这也形成了后发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局面。

站在率先老龄化的先发国家视角，不断出现的海外“人口红利”，使其能够低成本维持其内部福利体系，不用自行生产大量基础生活资料，仅通过全球贸易即可将本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维持在低位，由此压低了先发国家的通胀水平；而海外投资收益又使先发国家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但这主要是站在先发国家大型企业和整体经济增长的视角去看。站在先发国家民众的视角看，因全球化而失去的生产性就业岗位，导致部分先发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出现问题。因此后发国家的“人口红利”，既是先发国家中上层的蜜糖，也是其中下层的砒霜。

很显然，东亚诸国，尤其是晚近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是二战以来先发国家的主要“人口红利池”。然而，随着东亚诸国、尤其是中国的快速老龄化，全球“人口红利”是否可以永久维持下去，在中国之后还能否出现“第二个中国”？这并非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英格兰银行（即英国央行）前首席顾问 Charles Goodhart 认为：“中国将不再是一个全球抑制通胀的力量。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中国的）人口压力和刘易斯拐点意味着，迄今为止经济从未面临的通胀压力可能会成为现实，将令人猝不及防”。

显然，对今日中国老龄化问题的思考，需要突破“当下”和“本国”的局限，应当站在历史和全球的高度，全面梳理全球人口膨胀及老龄化的成因及其影响。不但应当分析中国老龄化对本国的影响，还需要看到今日中国已然是全球经济最为重要的一环，各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将产生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攸关全球，甚至有可能成为重塑人类社会未来的重要变量。

为充分理解二百余年来全球次第起伏的人口浪潮及影响，本文将回溯考察导致近代西欧首次出现人口膨胀的原因及其影响全球的过程，这将不可避免的涉及对欧洲农业、工业和医疗卫生革命的考察，以及对欧洲殖民史、反殖民史和全球化的考察，这

些内容与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等重要议题相互交叠，进而使本文涉猎的内容超过了人口学和人口经济学通常的研究范畴，所引用的部分资料也为国内此前研究所罕见。很显然，如此广泛的讨论是一篇文章难以尽言的，甚至也是一本专著难以尽言的。本文希望抛出一个遍布要点的“树干”，将中国关于老龄化的讨论推向纵深，唯其如此，才有助于使老龄化的讨论跳出就事论事的窄圈，才有助于全社会形成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共识。

一、回到原点——英格兰的人口膨胀

英国人口学者 Paul Morland 认为，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变化始于不列颠群岛，以及出生于此并且散布于北美和澳大拉西亚的人。这种变化很快传播至欧洲其他国家，并由此传播到亚洲及拉美（Morland, 2019）。英格兰的人口在1541年时只有277万，1656年时增至528万，其后经历了70年左右的人口波动，在1730年代仍然维持在530万左右。但到1801年时，英格兰人口突破了866万，至1871年增至2,150万。

为何人口膨胀始于英格兰？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从上述数据看，在1750-1870年代，英格兰显然经历了导致其人口迅猛增长的历史性变革事件。当时英格兰人口膨胀所导致的压力已受到广泛关注。毕业于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主修数学、时任圣公会牧师的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了影响后世的著作——《人口论》。

马尔萨斯认为：“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要的，并且会基本保持现状”，“人口若不加以约束，将会以几何比例增长，粮食等生活资料却只会按算术比例增长”。这意味着，“生存困难始终会对人口构成一种很强的抑Z作用”。马尔萨斯认为，“预防性抑Z（preventive check）和积极抑Z（positive check）阻止了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谓“预防性抑制”是指“人们对供养家庭所必经的种种困难的洞察力”，而“积极抑制”则是指“下层阶级遭遇困难而不能给予子女以适当的食物和照料”（Malthus, 1798）。尽管后来的农业技术进步和工业化使粮食问题得到解决，但马尔萨斯关于资源束缚人口增长、个体受限于经济条件将主动减少或放弃生育的判断，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

回到当时的英格兰，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人口增长→粮食价格上升（实际工资下降）→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下降。但现实发展却与马尔萨斯的判断不尽一致。后世学者的研究已经显示，当时英格兰人口规模受粮价抑制的情况已经开始改变，人口增长的同时，人们能够获得的粮食也在增加，这导致了结婚率和生育率的上升，也提升了人们的营养水平，使死胎情况减少（E.A. Wrigley & R.S. Schofield, 1981）。

英格兰当时粮价的下降至少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农业革命的影响。

农业技术的发展提升了粮食产量。从1781年~1806年的历史数据看，英格兰人口增长率明显上升的同时，粮价增幅却在下降，这意味着粮食G应出现了显著变化（Overton, 1996）。英国学者提出的英格兰农业革命，大致从16世纪延续至19世纪（Overton, 1996）。事实上，英格兰农业革命是欧洲农业革命的一部分，包括马铃薯、玉米、烟草、甜菜等重要新作物的引入，犁、耙等传统农业工具的改良，脱粒机、收割机、播种机等畜力农具的广泛使用，乃至农作物休耕轮种制度的采纳，都并非仅仅出现在英格兰，而是更早或者同期出现在荷兰、西班牙、法国、德意志地区等。英格兰在农业方面的主要贡献至少包括三方面：诺福克四年轮作法（Norfolk four-course rotation）的推广，基于蒸汽机的动力农具的使用，以及化肥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同时期还有德国和法国）。此外，英格兰的圈地运动客观上使土地合并、可耕种面积变大，更利于采用新的农业技术。（Habakkuk & Postan, 1965; Overton, 1996）

二是工业革命的影响。

工业革命对农业技术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新的冶铁方法为制造更多的铁犁提G了大量低成本原材料；蒸汽机的发明使农具从畜力驱动变为蒸汽机驱动。工业革命更重要的影响在于，英格兰首先开始工业化，得以通过出口工业品获得更多的粮食。由于具备工业基础，与航海时代的西班牙、葡萄牙相比，英国能够控制更多的殖民地，包括更多的农作物产地。

三是废除“谷物法”的影响。

1672年起，为保护本国粮食种植，英国颁布了一系列被统称为“谷物法”（corn laws）的法律。谷物法一开始对粮食出口进行补贴，后来限制外国粮食进口。随着英国工业化，铁路、公路、航路等交通状况获得极大改善，但自1815年后，经济衰退、社会动乱和政治激进主义时有发生。1840年时，英国已无法提G足够的粮食保证人民生活，加之马铃薯晚疫病导致了爱尔兰1845年大饥荒，社会状况恶化。此时自由贸易的呼声日益高涨，1846年英国终于废除了谷物法，粮食得以大量进口，填补了本国生产的不足。（James, 1997）

上述三方面使英国人口在增长的同时，粮价增幅受限，经济水平提高，结婚率和生育率均上升。与此同时，由于营养的改善和生活标准的提高，英格兰的死亡率在1850年代前开始下降；1850年代后公共健康和卫生状况的改善，以及18世纪以来种痘免疫、外科手术、血液血管研究及流行病学等医疗方面的进步，使死亡率继续下降（Hinde, 2003; Dunghison, 2020;）。生育率的上升与死亡率的下降，使英格兰领先于其他国家开始经历人口快速膨胀。英格兰人口膨胀对其经济发展影响甚巨，Hinde 认为，1820年~1870年英国年均经济增长（年均增长率约2.5%）的一半都可归于人口增长，另一半则可归于总体人口的财富增长（Hinde, 2003）。但需要注意的是，英格兰此时大量新增人口仍未摆脱贫困，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产生的诸多压力仍在扩大。

二、欧洲人口膨胀及其对海外殖民的影响

从1750年~1850年西欧和北欧诸国的人口数据来看，在经历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英国人口总量与法国的差距已经显著缩小，并完全领先于其他西欧、北欧诸国（此时德国尚未完成统一）。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也最早受到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人口进入快速增长区间。

英国在工业化时期经历人口膨胀后，尽管经济增速提高，但工业化对传统社会经济的破坏与撕裂作用十分明显。圈地运动后，大量失地农民向大城市聚集，城市贫民早已增多，此时形势更加严峻。

卡尔·波兰尼在1944年回溯考察英国“济贫法”时提出：新的圈地运动浪潮赋予土地流动性且造成了农村无产阶级的。但“济贫法的恶政”却阻止他们凭劳动谋生。无怪乎当时的人会为这看似矛盾的现象而感到恐怖：一方面是奇迹般的生产增加，另一方面却是将成饿殍的大众人民与之相伴出现（Polanyi, 1944）。

所谓“济贫法”，是指英格兰早在1601年就颁布实施的一系列以救济贫困为目的的法律。波兰尼所谓“济贫法的恶政”，是“济贫法”在实施时，将当时的贫民限制在各教区施以低水平救济，却阻止贫民流动到其他教区以获得工作机会。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对此提出批评，他认为，劳动的自由流通被“济贫法”横加阻挠，是英格兰特有的现象。这种阻挠使得穷人很难取得任何地方的定居权，甚至不准穷人在所属教区以外的任何地方工作（Smith, 1776）。

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对“济贫法”也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济贫法”表面上是通过向富裕阶层征税去救济贫民，但实际上却在两个方面使贫民的总体境况更加恶化：首先，贫民穷到无力养家的地步时，却在接受救济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结婚生子，这只会增加人口而不会增加供养人的粮食；其次，济贫院的贫民需要消耗食物，而这会减少其他勤劳且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的食物，因而会迫使更多人依赖救济（Malthus, 1798）。欧美如果想疏离中国进而继续保持工业化以来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福利体系，唯一能够依赖的也就是南亚和东南亚。但正如人口学研究所揭示的，仅仅人口众多，不一定就能成为“人口红利”。究竟哪一方更能够利用未来的海外资源，将视不同国家企业未来的海外竞争力而定。

站在今天这个时点，未来一两代人面临的根本问题已经不是国家间的竞争和较量问题，而是工业化和全球化以来人类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否需要做出重大调整的问题。回到老龄化，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更加关注已经存活于世的人，而不是那些可能出生的人；我们都更应该让经济发展去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让人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和零件。或许，从英格兰的人口膨胀，到中国的人口收缩，才是一个完整的周期。